




续西行漫记

(美) 尼柁·韦尔斯著



续西行漫记

下 册

〔美〕尼姆·韦尔斯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

目 录

(下 册)

第三章 妇女与革命

- 一、中国的妇女革命家……………(199)
- 二、共产主义妇女的导师——蔡畅……………(216)
- 三、无产阶级的领袖——刘群先……………(235)
- 四、红色女战士——康克清……………(264)
- 五、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279)
- 六、红色民国之妇女……………(315)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的过程

- 一、中国苏维埃的改制……………(325)
- 二、中国革命的分析……………(337)
- 三、未来的窥测……………(383)
- 四、关于托派的二三事……………(393)

第五章 中日战争

- 一、第八路军的行进……………(407)
- 二、九月的早晨……………(414)
- 三、“等到他醒来的时候……”……………(431)

附 录

- 八十六人略历……………(451)

第三章 妇女与革命

一 中国的妇女革命家

苏维埃妇女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近代婚姻，是非常坚贞的，因为婚姻平等权在东方是一种革命的观念，而且是‘新女性’必须坚守的营垒。中国苏区的革命妇女，对于自由恋爱一类愚蠢的淫荡思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她们看来，新婚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而且应当保卫它。我曾听说过，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蒂克，’早已像毒花一样，给革命潮流冲刷掉了。现在前进的中国女性，跟西欧宗教革命时的清教徒妇女一样，正从事一种严酷的斗争，以反抗颓败堕落的社会。

而她们的新婚姻的成功，确是很足惊人的。不管一切的困难，和长年的革命工作的隔别，苏区领袖们显示了一种最专诚的婚姻的模范。实际上所有三十个妇女领袖的婚姻，都很美满，而且大多数都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譬如蔡畅，一九二三年就与李富春结婚，当时他们都是留学巴黎的‘工读生。’刘群先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与博古结婚，那时候他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当她的通译。康克清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与朱德结婚，当时她是十七个农民游击队领袖中之一。邓颖超与周恩来相互间的挚爱，是从一九一九年两人都是学生运动的领袖而在天津一同被捕时就开始的，虽然直到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从欧洲回来之后，他们才在广州结婚。陈慧清是一九二九年在香港与邓发结婚的，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是华南工人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它的妇女份子。其所以尊重的原因，绝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因为他们经过长年而艰苦的斗

争，在‘红星’之下，获得了她们合法的地位。她们如果不是中国革命中‘较好的一半。’那么必定是同等重要的人物。寄居于中国的外侨，大都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女子要比中国男子更富于男性的特征，甚至就是那些最顶‘死硬’的仇华的外人，对她们亦不得不故示钦佩。

使中国妇女备受压制的原因，并不在于她们的质，而在于她们的量。如果她们是少数的人，她们一定老早就在中国建立了她们的独裁，就因为妇女人口的过剩，使得她们在婚姻与劳动市场上，成为一种便宜的商品。然而就是在封建制度之下，中国女性在某种限度内，仍然坚持着她们的立场，不像日本或印度的女性那样陷于被屈辱的地位。我曾经这样猜测过，缠足的起源，是由于中国女性的卑劣的‘主子们’为要阻止任何种妇女‘运动，’感觉到有残害女孩子们的身体的必要。缠足是结婚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发育未完的孩子，交给一个不受羁制的新娘。中国个别的女性，很少获得权力，但当她得到了时，总是带着报复性的。我们用不着指出中国帝王们多半是嫔妃们的玩物，只消看看家庭里那可怕的婆婆（她之所以取得权柄，完全是因为岁数大的关系）就可以晓得了。男人们倒很微幸，因为婆婆们的暴虐，主要是施在媳妇身上。不过媳妇亦不是好惹的，于是棋逢敌手，家庭间永远成个僵局。毫无疑问的，婆婆们的这种权力，是旧社会引诱老太太们的行为到反动方面来的一种贿赂。

中国各阶层的女性，当她们还没有因年老而变成反动之前，全都是叛逆的、坚决的、和非常勇敢的。在革命运动中，她们跟先驱们并肩前进——在中国每一次著名的学生示威运动中，女学生们时常占着大多数，而当学生警察间发生无可避免的冲突时那些最后被驱散的，亦正是她们。国民党革命时期，女学生和女工们非常活动，而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与落后势力

联合，共同反对左派时，这些年青的妇女们可一点亦不宽容他们。蔡畅在她的自传里谈到这时期的妇女时，曾这样说：“只那一年，全中国就有一千多的妇女领袖被杀，她们不尽是共产党员，有些是学生，有些则是资产阶级的妇女，但都是革命的领袖。……在广州暴动之后，至少亦有二百至三百个妇女被杀。当时如果一个女人是剪发的，便被认为共产党员，而判处死刑。这是千真万确的。”稍后，各地牢狱里便充塞着那些继续在‘白’区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人们，另一些人则毫不踌躇地走入被封锁的苏区，共同分担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命运。

中国妇女最先参加革命工作的，是女学生和小学女教员，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她们最初的要求是取得入学，自由婚姻，和承继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无组织的女权运动的趋向，而它主要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后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运动中，领导了女工和农妇们从事革命的行动。这是勇敢的和富于戏剧性的斗争，至少，它已给予当时的新文学以极好的题材。譬如作家郭沫若，就费了他的许多时间，使‘新女性’理想化。两个共产党的女领袖蔡畅和向警予，就都是这时期的学生。

我们应当注意：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别的基督教团体与学校，在中国妇女运动上，曾给予极为进步的影响。他们坚持男女共同教育，结果得到成功，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社会影响。据我的观察，甚至就是现在革命的前进的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亦大部分曾经受过基督教理想的影响，虽然目前时势所趋，大家都否认他。不过，这些青年人对基督教之所以感到兴趣，与其说是纯宗教的，勿如说是由于基督教的哲学观和伦理观。而那些确实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的人，亦大半跟那些加入共产党的人相类似，全都怀着博爱的天性和同情被压迫者的正义感。在它初期的影响中，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是一种非常革命的理想。

在一九二五年五四运动时期，新的女工运动，在共产党影

响之下发展起来了，整个妇女运动亦因而得到了极有力的推动。这种新的女工运动，跟在一九二三年平汉路罢工时发动的整个中国。劳工运动同时开始。这一运动的奠基人就是向警予。一九二三年她从法国留学回来，成为共产党妇女部的第一个领导者，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于一九二八年被处死刑。向警予反对女权主义，而把这一运动导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于是千千万万的女学生加入共产党了，因为共产党不单在口头上谈论男女平等，而且在他们的革命工作中。除给她们平等的权利外，还非常重视她们的才能。依照蔡畅所说，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妇女协会，就有三十万会员。现在成为无产阶级领导者之一的刘群先，就是这新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培植出来的。当时她是无锡的女工。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转变了以后，艺术家和作家，为了对右派反动倾向的反感，多半左倾起来；而前时的个人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左派份子，亦开始支持共产党了。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妇女运动所残留下来的人物，亦多少为左翼所吸收。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就是被吸收者的一个，当时她还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国民党两个最重要的领袖的妻子：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凯夫人（何香凝，）亦竭力反对反动，他们从那时候起就一直鼓励和支持着左派的妇女运动。我想在一九二七年的反动以后，原来革命的国民党的妇女领袖，现在仍然继续从事真正的革命工作的，她们怕是仅有两个。就为了这一点，这两个人成了中国青年——由基督教女青年到共产党员——所崇敬的偶像。

当苏维埃运动开始时（在右派与地主联合共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农妇们随即群起参加战斗，中国共产党最早最大的‘赤色’希望，是在广东的东江，中心地则为东江的海陆丰。这一带的住户大半是妇女。因为男人们大多跑到南海一带去找

寻职业，所以执掌一切农事的，全是女人。目前共产党妇女部的领袖李建贞，就是东江区的一个女军人，朱德的太太康克清，则是从江西农妇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物。

女学生的运动完全集中于京（当时的北京。）沪两地，因为大多数的中学都集中在那儿；同时，女工运动自一九二七年以后，亦差不多完全局限于上海一地。但中国的战斗妇女，却多半来自南方——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这些地方的妇女很多充任苦力，她们的身体跟男人一样硬朗。我曾经问朱德什么地方女性是最好的战士，他这样回答道：

“我想广东的妇女大概是顶厉害的。其次也许就是福建。在广东的东江区，男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因此一切的生产工作差不多全部落在妇女们身上。这些东江的妇女从未反对过红军——甚至那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亦是一样。”

粤桂的妇女，在一九一七年的事变之后，马上便被国民党当局控制了；但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和别的苏区的妇女，却在这些省份的苏维埃革命中，从事极猛烈的斗争。妇女们虽然好像都巴不得跳出厨房走上火线，但除四川之外，被准许加入正规军的，只有几个人而已。（与游击队一道作战的倒很多。）因为这种工作，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在肉体上。亦需要极高度的忍耐性。

在这几个人中，贺龙的妹妹贺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湖南领率一师正规军，后来在战场上被杀；另一个就是朱德的太太康克清。在四川，徐向前似乎比别的红军将领更尊重女战士，因为他特别拥有一队娘子军，这是康克清在她的自传里谈到的。我曾经询问朱德，为什么在他的主力部队中没有女军，他回答道：

“有许多妇女非常渴望加入正规军，但我们不能收容她们。这主要的是训练的问题。其次，红军是非常流动的，而她们在战斗动员上，却应付不了这迅速的行军，亦不能胜任地携

带必需的用品，又因为生活万分困苦，她们得病的机会总比男人来得多。无论如何，她们的战斗精神倒是挺好的，而且在别的任何普通军队里，她们能够成为很优秀的士兵。在游击部队中，英勇的女战士是很多的。

“在江西的时候，曾将妇女编入战斗部队里，但她们未曾参加阵地战，只从事散漫的小战而已。她们在夺获敌人的辎重与武器上，很为胜任，并曾经击败过敌人的一两团兵。”

湖南产生的第一流共产党女领袖，似乎比别的任何省份来得多，像上面说过的蔡畅、向警予、丁玲、贺英等都是湖南人。长沙的‘周南女学，’就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摇篮，上述四人中的前三个，都是周南女校的学生。

在江西苏区里，后方所有的一切工作（包括教育活动在内，）差不多全由女人和儿童担负，参加工会的妇女在一万人以上，这是刘群先的自传所说的。红军开始长征时，当局动员妇女们加入赤卫队，以防卫苏区，所以在白军占据苏区之后，苏区妇女领袖被害的至少达数十人，只有与红军一道长征的五十个人存留下来。这五十个人中，有三十个是共产党的女领袖，二十个是看护和别的妇女。在长征中，这三十个女领袖没有一个人死亡，只有几个曾经患过重病。这妇女队的队长就是刘群先。她曾说过，在长征时，就由她和李伯钊一道到地主的家里去征发她们自己的粮草。大体说来，她们几乎不曾得到军队里男人们的看顾，全都能够照料自己。我想，这艰难万分的长征，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勇敢，还需要肉体上的健强，她们能够胜任地完成这次长征，使得她们在苏维埃运动上增加了不小的威望。要是谁想侵犯这些长征的宿将中的任何一个时，她事先应该反复三思，尤其是在别的二十九个同伴自动地来帮扶被侵犯者的时候。

这三十个不惟敢参加长征，而且在经过中国许多最危险的

高山大河之后，还能活下来的妇女领袖，究竟是谁呢？我请李伯钊告诉我，于是她给我开了一张名单。（注）她们中九个人是学生，九个人是农民，两个人是无产阶级，两个人是教员，两个人是主妇，蔡畅由教员转成为‘职业的革命家，’邓颖超（周恩来太太）则由学生转成为‘政治组织者，’她曾经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阿香（又名阿清罗迈的太太）是一个‘广东人’（只这字眼就够说明她。）至于其余三个人的出身，她已记不清楚了。据李伯钊说，她们大半都是青年，而且全已结婚。这三十个人是由江西中央苏区到陕北来的，还有别的六个人，是一年后由湘鄂边区第二方面军过来的，此外还有跟第四方面军一同进入苏区的四川女人，连那女军也包括在内。

我觉得这些苏维埃女性都非常有趣，她们全都亲切而且恳挚，当我到了延安的时候，这三十个人有一大半恰好都在延安。苏区当局便在公共食堂里预备了一席特别而精美的点心，把我介绍给她们。这食堂是一个模范的陈列室，专用来教育本地的陕西人应如何注意食物的。它在门窗之上装着丝网，在器皿上盖着纱罩，并且洗涤得干干净净。在天花板和窗门上又缀着华丽的纸饰。为着吻合他们的联合战线的政策，他们以‘非无产阶级的’食物招待外宾，当地所能找到的美食，全拿来奉献客人。她们三十个人，没有一个会说英语，只有几个懂得俄

（注）经过长征的三十个妇女领袖是：出身无产阶级的：刘群先，陈慧清，学生：危拱之，刘英，李伯钊，钱希均，周月华，吴仲莲，谢小眉，李建华和丘一涵，农民：李建贞，危秀英，廖日华，吴胡莲，王乾元，钟玉林，刘彩香，李小红（有谓为李小红——译者）和康克清，主妇：郑玉，杨厚增，教员：金维映，贺志珍（又名贺志莲。）专门人材：蔡畅，邓颖超。广东女性：阿香，出身不明者：廖施光，韩世英，和邓六金。

文和法文，而当时城里又只有一个女通译——吴广辉一个新的女学兵。我们虽然只能经由通译作些极简单的谈话，但我却跟她们中的几个人混得很熟，每天跟着她们一道到处跑跑。

她们中只有三四人跟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其余大半住在前红军大学的女宿舍里，有些则住在她们各人的特殊工作所在的地方。那些进红军大学（现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译者。）像朱德夫人，贺龙夫人，萧克夫人，（注）则在校里研究军事和政治等学科，以便将来领导各种特殊的革命工作。

这些人从来不用她们的丈夫的姓，而用原来的姓，或是革命的化名，就是在革命工作上，亦把她们自己当做个完全独立的单位。她们穿着正规红军的服装，在军帽之下，是剪齐的短头发，远远一望，和正规红军完全分不出来。

共产党妇女的领袖是蔡畅，样子矮小温和，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今年三十七岁（按作者计算年龄，全依欧美惯例，若依中国计岁法，她应该是三十八岁，又因此文是一九三七年作的，所以蔡畅今年已是三十九岁了。——译者。）她是一个早期的革命工作者，和毛泽东，蔡和森（她的哥哥）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是同时的人物。他们这一群是在长沙开始结合的。当蔡畅把她的生涯告诉我时，她还谈到当地早期革命运动的情形和她的兄嫂的动人的故事。他们这三个人在巴黎一起念书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留学生中非常得势，他们就在和它斗争时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核心人物，并非

（注）贺龙夫人与萧克夫人是姊妹，年纪很青，非常漂亮，有着优雅的贵族风度。她们新近跟第二方面军由湘鄂边区过来，因为刚经过长征，途中又遇到许多惊险，因此两人都很疲弱，我听说过她们两人又漂亮又聪明，而且是很精干的革命工作者。在会面的时候，我要求她们把各人的生涯告诉我，但她们既不告诉我，又拒绝我拍相，因此恐怕这两人是本书中的神秘妇人了。

由莫斯科，而是由法国的留学生所供给。而组织这留法工作的是毛泽东，他本人未曾参加，但由此却造成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如周恩来，李立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李富春（蔡畅的丈夫，现为甘肃省苏维埃代理主席，）罗迈（党校校长，）傅忠（第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贺昌群（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和赵士炎等上列这些人中，有五个人在一九二七年被杀。

无产阶级的妇女领袖刘群先，由无锡某工厂的女工出身，是革命的产儿，是妇女权利的勇敢的维护者，现在被举为苏区国营矿业及工厂的指导员。她对本分的工会工作极感兴趣，同时推动妇女运动，亦化了她许多工夫。她今年三十九岁，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物。

最有趣的人物是朱德太太康克清，今年刚二十五岁。除红军的工作之外，她对一切的妇女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她的生涯是国民党下的农民运动和苏维埃下的赤色游击队的写照。

其次就是毛泽东的太太贺志贞。她是一个细小柔弱的妇人，有秀美的脸庞和羞涩文雅的风度。她化了大部分的时间以养育子女和看顾她所崇敬的丈夫，但她亦是一个活动的共产党员，和毛泽东结婚以前，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内战中，她比别的女人遭受更多的苦楚，因为她生过几个小孩，在长征中前后曾被炸弹炸伤了十六次。贺志贞是湖南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即加入毛泽东的第一军为宣传员，在毛的发妻（注）被杀之后，就和毛结婚。

洛甫的太太刘英，是我们所能想像到的身材最顶矮小的人物。我简直想不透，她为什么在长征中，没有给大风刮走！她像知更鸟一样的活泼和伶俐，整天忙着青年团的工作。

另一个妇女运动的有趣的领袖，是李建贞，现在只二十九

（注）毛泽东的发妻叫杨开慧。是北大教授的女儿，在红军运动开始时，即在湖南为何键所杀。

岁，但已是苏维埃妇女部的部长。她的故事是值得详细介绍的。她是一个苦力的弃儿。参加时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最早组织的某一农民暴动。她住在著名的东江区，邻近海陆丰，（上面朱德已经说过，在这地区妇女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高身阔肩，刚毅果敢而且精明干练，实在是中国最受压迫的阶级，在革命领导的形式下所能产生出来的最动人的标准人物。她多少使我想起勇武善战的爱尔兰女人，因为一方面，‘广东人’时常被人家称为‘中国的爱尔兰人，’其次她说话时老带着一种爱尔兰语的重音，譬如她说‘二十二’时，不是‘erh-shih erh’而是‘oi-ssu-oi’

她对我讲的故事，是‘中国战斗的爱尔兰妇女’——广东妇女的最好的写照。

“我的双亲都是苦力，专给造房子的人挑砖。母亲有十个儿子，全很结实，又有两个女儿。我的姊姊很早就死掉，在我满了一岁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我是一九〇七年生于广东丰顺县的，我过继的那家人家，却住在南面东江区，邻近海陆丰的地方。

“我过继的是一家小商人的家，有三个孩子，可没有女儿，因此待我很好。除父亲是商人外，家里其余的都是农人，耕种他们那三亩地。到了十一岁，我已落田做工和挑担东西，十七岁就跟那商人的一个儿子结婚，他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比我大十岁。当家乡发生农民暴动时，我就想参加革命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选出许多男人和女人来担负革命工作，我亦是被选的一个。那时的革命标语之一：是要求男女平等，反对旧式婚姻，各人自择配偶，这正是吸引我的主要的标语。我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我的丈夫却比我早一年。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们东江区起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

我丈夫的兄弟领导的，他本人在暴动中被人杀害。暴动主要的原因是国共分裂，这分裂使农民遭受了残酷的待遇，而直接的原因是地主的压迫。当时恰是五月龙船节，地主收取租金，要是有一个农民付不出来，收租人靠敲打他，带走他所有的一切。因此农民们起来战斗了。第一次暴动的时候，农民们毫无组织，各自为战，但到了第二次，就组织了集体的斗争。暴动开始之后，军队开来围剿，于是农民们被迫从事武装自卫。但在暴动时只有几个农民被杀，我丈夫的兄弟也在内。

“在暴动中，我做了宣传队的领袖。我过继的这人家对革命十分同情。家里的人除我之外，还有四个人参加革命，而且全部被杀。我的丈夫是一九三〇年在埔之战被杀的。他的弟弟是红军，一九二九年战死在福建，另一个兄弟则在一九二七年被杀于广东。至于我的本家，现在已十年没有音讯，我始终没有给我的兄弟们去信。

“暴动之后，叛变了的农民都不能回到他们的老家，因此全移到另一个地方，加入了顾太真的第十一军，这是共产党的部队，现在还存在着。我们这些人中，共有一百二十个男人和二十个妇女，一九二七年八月，海陆丰最重要的那次农民暴动，（它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我亦参加过的。

“我在顾太真（注）的部队里停了一年。我们重新分配土地，而当部队在各处作战时，我们便从事宣传工作。我们到过广东的兴宁，张罗（译音恐系原作者笔误，在东江一带，并没有一个名字与这相似的县份。）大埔和饶平。我亦帮着从事组织这些地方的苦力和工人。一九二八年，我跟第十一军一道做政治工作：一九二九年，我又改在一个县份里做行政上的职

（注）我想这是个从海陆丰苏区逃出来的队伍。后来就在顾太真领导下，与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合，就成为第十一红军的核

务，在大埔时，则担负妇女工作。

“在广东，妇女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且在这省份里，一切的苦力和脚夫不是男人，全是女人。她们还做矿工和樵夫。同时因为丈夫和儿子们都到南洋或别的地方做工，所以农事和家务亦只由妇女负责。她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工作的所得十分低微。由于广东妇女环境的恶劣，她们是中国最革命的，不怕战斗的女性。

“在广东时，我时常帮忙妇女们解决各种问题，因此她们对我很信任。譬如我曾在大埔负责组织苦力工会，当地所有的苦力都是女人，每天工资只有一角五分，但到了工会组织了一千个苦力时，她们已能够向雇主要求二角钱一天的工钱了，这次的成功，提高了妇女们不少的勇气。

“一九三〇年党派我到福建苏区去，我在当地担任福建区政府的一部份工作。一九三三年，我到了中央苏区的首都——江西的瑞金。

“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经过一年的跋涉，我同毛泽东纵队到达晋北。在长征中，我是红军的政治指导员。只要一个人有强壮的身体，长征倒并不是怎样艰难的。我在路上要携带一支枪、自己用的毛毡、和十五斤的食物，只有很短的时间曾以马代步，（本来我分到一条马，但在路上送给一个受伤的同志。）离开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女共产党员，只有三十人，但第四方面军离开四川时，至少有一千个妇女参加，并且路上还有别的妇女加入。这一千人大半是红军士兵的妻子，但在前线的那些女战士，倒不尽是结过婚的：

“我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十二岁，还住在广东。我现在的丈夫是邓忠襄”（译音）

我头一个碰到的苏维埃妇女，是李伯钊，那是四月里我到达云阳镇彭德怀的总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